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北京市文物局科研出版经费资助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著

新 日 下 訪 碑 錄 房 山 卷

辛卯之冬 李鑫華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014006205

K877.42

06

V1

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十五」规划项目
北京市文物局科研出版经费资助

新 日 下 訪 碑 錄

辛卯之冬 李燕華



房山卷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著



北航

C1693032



北京燕山出版社
BEIJING YANSHAN PRESS

K877.42

06

V1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日下访碑录. 1 /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编著.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3. 11

ISBN 978-7-5402-1967-3

I. ①新… II. ①刘… ②北… III. ①碑刻-汇编-北京市 IV. ①K877. 4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8)第 030181 号

书名: 新日下访碑录

作者: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著

责任编辑: 李剑波 常思薇

出版发行: 北京燕山出版社

地址: 北京市宣武区陶然亭路 53 号

印刷: 北京华正印刷有限公司

开本: 880 × 1230 1/16

字数: 550 千字

印张: 33

版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版

印次: 2013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402-1967-3

定价: 8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我社联系调换。

联系电话: 010-65240430

《新日下访碑录》

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 编著

顾 问：徐自强 吴梦麟 赵其昌 刘之光 孔祥星 施安昌 韩 锐

编 委 会

主 任：王 丹

执行主编、通纂：刘卫东

编 委：韩 永 马法柱 萧纪龙 高景春 王 丹 陈晓和 许修堃
李仓钧

课题组成员（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革革 王晓静 刘卫东 李 巍 贾瑞宏 熊 鹰 李秀娟
滕艳玲 张云燕 谭 杰 张振华 杨朝晖 郭继华

本卷（房山区部分）：刘卫东 贾瑞宏

序 首（代前言）

关于《新日下访碑录》的名称，“日下”一词古已有之，并不陌生，如古籍所谓《日下旧闻考》、《日下尊闻录》等。“日下”原意“太阳下面”、“太阳底下”，寓意“天子脚下”，引申之为“古都”、“首都”、“故都”、“旧都”的别称，则“长安”、“杭州”、“汴梁”、“临安”等皆可为“日下”。具体到本课题，则用其“北京”曾为封建故都之意。所以，“新日下访碑录”就是“新北京访碑录”，还可理解为“新一轮的北京地区访碑录”，假设古有“日下访碑录”的话，我们则体现在一个“新”字上了。大家的访碑，实际是多年来，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石刻普查小组项目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前、后无论是普查，还是复查，大家都是头顶烈日、身冒严寒地将第一手资料费尽千辛万苦地获取之后，从而进行的再创造、再整理、再挖掘、再利用、再深化的过程。至于“考”字，我们目前暂还不敢启用，但正朝着“考”的方向努力。我们石刻普查小组与本课题小组的成员们，在“太阳底下”对于“北京地区”现存的“古代石刻”所进行的“新一轮”的“调查研究”，其实也是很符合《新日下访碑录》的名称的。我们希望本书的问世，在获得方家的指正之后，同样也喜欢我们的这项成果。因为本书毕竟是大家血汗的结晶，也是第一次披露了北京地区大量的石刻第一手资料，初步尝试了一把“考按”的研究形式。古语云“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希望对大家能有用！

在利用普查资料着手本课题的时候，我们事先已拟定了一个书籍编写体例和计划，但是在过程中却多少会发生一些变化，甚至有些会“改变



初衷”，因而形成了本书的若干特点如下。第一，“超常性”的发挥，也就是说在遵循原体例的基础上，又发挥、深化和增容了一些。这主要体现在“按语”部分。第二，真实性的体现，“如实”体现在“解题”上，“忠实”体现在“录文”上，而功夫则体现在“注释”与“按语”上。第三，延续性的工作，本书的完成仅仅是第一步，按计划，之后还有同样大容量涉及原行政区划另外12个区县两册书的出版工作要做。

由于我们是边摸索边前进的模式，所以现在的成书与原来制定的体例已经产生了一些不同。兹定《体例》如下：

一、本书系对北京地区现存及新出土、新发现的经过1995年来普查所能见到的石刻文物所作的著述、叙录、著录性质的专著。

二、所收录的内容包括：碑碣、墓志、摩崖、刻石、塔幢铭。

三、行文：一事一条。首列物名，下系解题、录文、注释、按语、拓照或碑影。

四、全书共分三册，每册30万字。

五、每册所含各区县的内容，各自独立成篇；

六、本书结构特点：以区县为基本单位，再以时间先后为序，同时兼顾类别。

需要说明的是：我们这次加进了“考按”，暂省了“拓照”或“碑影”及“石刻文物分布图”。文字内容较原定超出不少。

课题组还制定了撰写原则，如下：

1. 解题：现场调查表上的内容，按统一先后的次序记出。如石刻年代、规格形制、尺寸大小，额题、首题、首、身、座、侧、阴、阳、撰文、书丹、镌刻、立石、经理人情况，所在地点、现存状况等。

2. 按语：对比文物的三大价值、特点、传闻、记载、行款、字体、造型、位置、残损等值得特殊说明情况的叙述与交代。其中可以略有总结前人成就和说明自己不同看法的考证研究内容。

3. 为了照顾整体条目的均衡，注文与按语的撰写应充分考虑局部与整体的关系，应掌握“少者多写，多者少写”的原则，也即碑文篇幅大者可以简注、简按，篇幅小者则可适当多注、多按。

4. 录文：最主要和著名的不可不录，对于北京或该区县有特殊意义的要录文。此前从未著录（第一手材料）过的碑刻要录文。

录文力求准确无误，一依原碑格式、行款、字体加以誉录或标明，并



加以新式标点以及特殊符号。如：

衍、夺、补、勘文规定如下：

(1) 衍文：在按语或括弧中说明。

(2) 夺文：以“□”号标明，如字数不确定，则以□代替。

(3) 补文：所补文字需外罩“□”框。然而推断过程可以在按语中具体说明。

(4) 勘文：亦需在按语中说明。

5. 每个条目含名称、解题、录文、注释、按语，文字容量掌握在 1000 字左右。

6. 录文略：凡碑不必全录或不能全录者，择其关键数语或可以说明问题者抄录，并以分析总结性语言加以连缀。

7. 碑照拓影：(包括拓影或碑影)全面均衡，择其典型、有价值、艺术性高或局部特写、形制特殊者，视具体情况而定。

但实操时也有些改变，鉴于实际情况，我们鼓励录文时“准确无误”地使用“规范汉字”，繁、简则不必拘泥。“录文略”的形式，偶尔在“按语”中使用，只是转引他书以作说明。

我们衷心地希望，本书能为我们的同行、同好们带来工作、爱好上的方便。期待着你们的反馈！更希望由于你们的“反馈”为我们后两册书籍的撰写带来指导与方向。

《新日下访碑录》课题组长刘卫东于田庐归隐

2011年8月18日

序 一



“日下”一词，用为首都、京城或都城的比喻，首见于《晋书·陆云传》。传中有陆云与张华对话一节，其中有“云间陆士龙”，荀曰“日下荀鸣鹤”。荀名“隐”字“鸣鹤”，颍川人。颍川与当时西晋的首都洛阳近，故称“日下”。其后，唐初文学家王勃在名篇《滕王阁序》中，也有“望长安于日下”一语，以“日下”比喻都城长安。

清初学者朱彝尊在编辑京城历史、典故的著作中，也将其书名称为《日下旧闻》，这是以“日下”一词颜书名之开端。朱为清初康熙年间的大学者，博学多闻，以布衣入选康熙十八（1679）年“博学鸿儒科”，与时人姜宸英、严绳孙同称“海内三布衣”；又因编著有《经籍考》、《词综》等古籍，又能工词、作诗，不仅与当时大儒查慎行齐名，而且于其时之顾贞观、陈维崧合称为“词家三绝”。这样的一个名家，在编辑京都史迹、纂成的有四十二卷体量的大书，也用“日下旧闻”命其书名，可见“日下”之意，系喻指北京帝都，应是毫无疑义的。其后，乾隆年间，由于已达“康乾盛世”顶峰，各方面都有很大变化，尤其是对京城的改造，园林的建设，更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文化事业也更趋繁荣，故乾隆下旨，重编京都史迹，将有关内容，析为星土、世纪、形胜、宫室、诚实、郊垌、京畿、侨治、边障、户版、风俗、物产、杂缀等十三门，分类纂辑，编成为一百六十卷的巨著。其与过去朱氏者相较，不仅门类有增，内容更丰富，文字更是大增了三倍多，形成数十百万言的大书。它系统、全面地反映了清代前、中期京城的全貌。但其书名仍袭用《日下旧闻》而不改，只是新加了一个“考”字和反映皇家尊严的“钦定”二字，而且乾隆皇帝所题的书之“缘



起”诗中，还引用了西晋时之“日下荀鸣鹤”一句。由此可见，“日下”喻京城，过去是喻长安，当今是喻北京之意，已得到了皇家的赏识与共鸣。

嘉庆年间，由佚名氏编著的反映北京都城史迹的专题著作（主收清代宫廷及乾隆诗词等）数量也达五卷之多，其名亦沿用“日下”而加字为“尊闻录”，可见，这一“日下”以喻京城之意，已普遍为学人之共识了。

今天，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再以“新日下访碑录”为课题名称，立项探赜，使之能系统、全面地寻访北京地区现存碑石的存佚状况，编辑著录一部约三百多万字的九大册巨著，这不仅是继承了我国固有优良文化的传统，而且还以当今现存的文物考古实际出发，进行专项的收集整理，也可谓是一个创举！

21世纪以来，我国在30年来改革开放的基础上，经济大发展，人民安居乐业，并努力奔赴全面的小康；大力开展文化建设，力争复兴中华民族的新胜利。在这种形势下，他们进行“新日下访碑”这种带开创性的工作，值得大书特书，并予以肯定与弘扬。

他们在大量实际工作的基础上，现已编成的书稿，笔者初读一过，感慨良多，受益匪浅，略记数端，以示祝贺！

首先，该馆的同仁们，多系建国后出生，由新中国培养的一批新时代的文物工作者，他们能在各级领导和一些老专家的支持、指引下，能数年如一日地、辛辛苦苦地跋山涉水，不惧风吹日晒，不畏道路崎岖，走遍北京的山山水水，各个角落，寻访各个地区现存碑石，不漏掉一个线索，不错过一个机会，坚持亲访亲闻，以求其真，以力争得到原石原物的精神，应是当今学人应坚持和发扬的学风和具有的治学态度。只有如此，才能真正把神州大地上的文化遗产发掘出来并继续发扬下去，为振兴北京文化事业和光大中华传统文化做出贡献。

其次，他们在整理所得材料的过程中，严格遵循“亲见亲闻”有“原石原物”存在的“诂碑”原则，一一扒疏后，将其分为“正文”与“附录”两大部分，成文付梓，这更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列入正文者，为原刻保存较好，内容较丰富，价值较大者，详加整理揭示，以利学人使用，读者研读；列入“附录”者，虽各方面都比较一般，但也系现存之遗存，总在不同的方面具有一定的价值，一并公之于众，既使读者能知其北京现存碑刻状况，也可供学人、读者进一步的探索，也可能还能从中揭示出更多的新信息，产生新的意想不到的成果。

第三，他们刊布的“正文”，是整理研讨的重点。他们从“解题”、“录



文”、“注释”、“按语”等四个不同的角度，揭示论述每一种碑刻的内涵。其所用方法，既继承了往昔先人整理碑刻文字的优良传统，也照顾到了当今年青学人，尤其青年读者古文献水平不高的实际，以利于他们的阅读、使用。在这四项工作中，最难的是录文、注释、按语三者。这也是该文整理中最见功底之处。“录文”难在辨字与断句标点，他们坚持泐残者不录，不清者不妄录的原则，以求能如实地反映原文；“注释”难在问题复杂，多种多样，涉及面广，没有广博的见闻和多种多方面的文献素养难以胜任其职；“按语”带有评价性质，对其石之相关方面，没有更多的了解，没有更为多方面的文化科学知识的沉淀，是做不好归纳综合、比较分析、科学地辩证地正确评判文物的价值。《新日下访碑录》的编著者们，尤其是总纂者，对这几方面的工作，虽不能说已做到尽善尽美，无一疏漏、无一可商之处，但从已有成果看，他们是下了功夫的，是有不少亮点的，读者阅之时会有很多收益的。

第四，该《访碑录》收录的正文约为1000—1200种，附录也约在1500—2000种左右，数量是可观的，内容是丰富的，加工是有一定水平的，我认为是一部值得推荐的好书，特予介绍。同时从另一方面看，它与1994年正式出版的《北京图书馆藏北京石刻目录》相较，其所收数量还有近一半的差距，该目录收有6340种，《访碑录》约为3000种。但《访碑录》是现存的石刻，都有原石原物存在，而《石刻目》只是历代以来曾有过者，现在可能有不少碑石已经散佚。两者在比较中使用，可为今后的访碑，继续探寻北京石刻文化遗产，提供若干新的线索。

总之，《新日下访碑录》的问世，是北京地区石刻文化遗产的保护与研究，弘扬与光大作出的一种新贡献。过去曾有学者对《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百卷本的出版，做过一次评价，认为它是中国刻在石头上的一部“二十四史”，可与中国“浩如烟海”的古文献相媲美。现在，随着《新日下访碑录》陆续的问世，是否也可喻之为北京地区刻在石头上的一部北京的“二十四史”，可与北京地区现存古文献媲美呢？！

以上数端，只是笔者对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的同仁们，对近年从事《新日下访碑录》工作情况的初步了解和其成果的肤浅感受，行于笔端，只为抛砖引玉。是为序。

徐自强

2011年孟冬草于京华蜀晋斋

序 二

北京不可移动石刻文物整理研究的硕果

当刘卫东先生将厚厚的三册《新日下访碑录》第一部样书交给我看时，往日如烟的记忆又重新浮现在我的脑海中。早在1987年，由五塔寺文物管理所发展为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之时就开始了向博物馆方向发展的历程，那时任馆长的韩永和书记马法柱两位年轻人，努力探索这座北京唯一的专业性博物馆的性质、职能和工作任务，并期盼能承担起保护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重任。首先了解经“文革”洗劫之后现有石刻文物的现状，掌握北京石刻的分布特点、类别的比例、重要石刻的安危，同时也可在实践中培养年轻的专业人员。保护传教士墓碑和摩诃庵明代三十二体《金刚经》等较大项目，就是当时的重要举措。之后就开始了北京地区石刻文物的普查工作，我和刘卫东同志先后调入该馆后也立即参加了工作。一开始勘查时，强调要做好填表、记录、拍照、捶拓必备项目，能查到的一定不怕艰难到现场，大家风餐露宿，掌握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为日后编辑此书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也使我这个学考古的又爱上了石刻文物。韩永馆长特别重视发挥学术委员会的作用，要求以赵其昌为首的学委会对馆内的业务工作进行论证、指导，四位先生还分别担当专业人员论文的选定与辅导，重大课题更要深入研究。记得当时为此书的定名还进行过辩论，探究用此书名的





利与弊，在召开有关专家的座谈会上定下了这一具有多重含义的书名。一方面表示“首善”之地，另外也记录了普查队员们的辛苦，今天看来这一书名既贴切、又能吸引人。北京石刻、方志类古籍有《雪履寻碑录》、《日下旧闻考》等书，又添《新日下访碑录》一书相对应，更重要的是可为发展北京文化事业增添新内容。普查只是第一步，进入室内整理则更是艰巨的任务，因为北京历史悠久，所存石刻文物居全国之首，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民族、艺术诸多方面，将近四千件石刻文物要录文、注释、评介，文字量相当大。所以我们经过商量，决定分成三卷出版，每次收入六个区县，使众寡不平衡的现象在安排上做些调整，达到全书较为平衡。如房山区、门头沟区石刻文物特别丰富，就搭配上大兴、通州、石景山区、顺义区，按区集中排列，让三部书问世时既能全面又较合理地展示北京石刻的价值。主编者刘卫东已作了序，道出了编辑此书的意义及甘苦，廿多年的工作终于开花结果。2011年是我从事北京地区文物工作五十周年，曾转战过北京文博事业的诸多部门，但年轻时多以“文物救火队员”的身份在团队中做出自己应尽的一份力。那时“著书立说”离我们较远，政治学习第一，资料要归公，不像今天年轻人一参加工作就能有专题项目多么令我羡慕啊！

《新日下访碑录》的编纂属于石刻文献的整理与研究。石刻文物起着承载信息、传递情感、表达思想的作用。过去金石学多以录文考证为主，对石刻文物的形制很少涉及，我们这部书在开始编辑时就强调要从文物的角度入手，除了录文、考证外，还要泛谈碑刻特点的知识，形象直观的效果，起到宣传此类文物的历史、艺术、科学的三大价值，证明石刻文物为不可移动文物中的一类而引起广大群众的保护意识，但愿这种初衷能得到体现和回应。

编者让我先睹为快，并希望写写读后感，但内容多、文字量大，只能简单地浏览一下，归纳起来有以下几点：

一、该书是在普查基础上经过整理成册的，材料新，又是亲历亲为的，具有真实性；

二、北京石刻文物分布地域广，山林、水域、废址处往往走不到成为遗憾，所以每到一地都要访问老百姓，向基层文物干部请教，尽量做到广而全。比如在门头沟区王平口古道的石壁上有摩崖石刻，山上古道崎岖，山下为湍急的永定河，望而生畏。为了录文，只好用望远镜眺望和攀上只能容一足的绝壁前，一人念，一人记录，尽量做到录文不误的标准。在整

理阶段又与区县文物工作者合作编纂，使他们掌握的信息和材料也能纳入。为了本书能有较多的信息量，本单位和相关区县的文物干部倾注的心血不能用言语表尽，今当任务完成时，苦尽甜来的滋味沁入心田，溢于言表。

三、成书经过多位同志认真的整理研究，最后由主编通纂，可能每人的角度不完全一样，虽有统一体例，但风格可能也稍有差异但不能影响整体效果。这里不能不表一下主编刘卫东先生，他始终参与了调查与编纂工作。整日坐在电脑前整理核对录文、形制描述，尤其在“按语”和评论上下功夫最笃，使全书从30万字扩充到百万字。翻阅了大量的文献，利用自己学习古典文献的专业功底，深化参与者的稿件，最后通纂，形成今日之巨著规模，如无心静、无利益追求的浮躁心态是完不成这一巨著的，这部著作是他和同仁们精诚合作的成果。

吴梦麟

2012年4月



序 三



刘卫东与《新日下访碑录》

刘卫东是我大学同学，又是研究北京历史文化的好友。我们经常聚在一起，讨论北京的城市历史文化、文物、书法、碑刻等。同时，我们又都是文博专家赵其昌先生的学生。刘卫东因为在北京市文博系统工作，与赵先生关系更为密切。记得赵先生编辑《明实录北京史料摘要》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西四北大街路西胡同内，刘卫东经常出入那里，给赵先生做助手。还有文物专家于杰先生主持编辑、出版《北京市志稿》，这也是北京历史文献整理的大工程，刘卫东直接参加了校勘工作，非常辛苦，一直到巨著正式出版。

近日，又得知刘卫东新的科研成果《新日下访碑录》出版，非常高兴。

《新日下访碑录》是北京历史文化研究的新成果，也是北京历史文化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新日下访碑录》是在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大力支持下，由刘卫东为项目负责人，经过数年努力，特别是整个项目研究团队，多次奔赴在北京市房山区、门头沟区、石景山区、顺义区、通州区、大兴区等，几乎在北京周遍边转了个圈，寻找到300多件石刻，写下将近100万字。这是多么大的工程，项目组同志费了很大的精力和气力。其中，我阅读了房山区金代《大安山龙泉峪西石堂尼院第二代山主超师塔》、元代《大



行禅师通圆懿公功德之碑》；门头沟区元代《重修通仙观碑铭并序》、明代《石窟崖修桥补路碑记》；石景山区明代《重修净土寺碑》、《黑山会刚公护国寺记》；顺义区明代《明张寿墓志》、《明曹应魁墓志》；通州区明代《宁母朱氏墓志》、《明宁平墓志》；大兴区清代《钟音家族墓碑》等碑文、铭文，深刻感觉到，做好这项研究工作，不仅要有热情、激情，还要有感情；不仅要有体力、精力，还要有智力。也就是说，这不仅是一件费力的科研工作，还需要有对古文、文言文、历史知识的了解，甚至是修养。其中，每件碑录，不仅要拍有照片，还有碑文名称、录文、解题、注、按语等。作为学科带头人刘卫东来说，他就具备这样的身体和文化素质。作为常年在文博系统工作的刘卫东，不仅是古文献学校佼佼者，而且是个石头迷。每当北京地面出土石料、石刻，尤其是碑刻，都会有刘卫东的身影。他不仅能鉴定石刻的年代、种类，还对铭文有研究。前几日走进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正赶上举办“百事如意”石狮子展陈，刘卫东负责接待我们，通过他的讲解，我们不难感觉到他对石刻文化的热爱、钻研、精通。尤其讲到元代石狮子的特点的时候，他用青蛙要跃起的姿态做比喻，把北京地区元代石狮子的特点——塌腰、细腰、小蛮腰说的十分象形，令人不能忘怀。

《新日下访碑录》也是众人拾柴火焰高的成果。这项研究首先得到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办公室的支持，被正式列入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同时，研究工作得到北京市文物局，特别是北京石刻艺术博物馆党政领导的大力支持。没有他们的帮助和支持，刘卫东和他的科研团队也是完成不了这项艰巨、复杂、工程浩大的科研任务的。《新日下访碑录》的完成，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北京文博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各区县文博工作者的帮助支持。其中，本书顾问、北京市文博系统研究员吴梦麟是这方面的顶尖专家，她对项目的科研工作给予了具体的关心、指导。从一个侧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刘卫东和他的科研团队，对老科研专家的尊敬、倚赖，这实际上是对中华文化和知识的尊敬和倚赖。在科研团队组合中，刘卫东和他的科研团队注意老中青结合，尊敬老专家学者，发挥学科带头人的作用，注意调动和发挥青年人的创新精神，是非常值得肯定的，这也是我们做好大的科研项目的基本保证。

衷心期待刘卫东和他的科研团队有更多更好的研究成果呈现出来。

北京史研究会会长 李建平

2012年5月18日

凡 例



一、一事一条，每条下系碑刻名称、解题、录文、注释、按语；

二、石刻条目所涉及文物的收录范围限于历史上的北京地区，而非只今天“北京”的行政区划范围；

三、书中收录石刻的时间上限不限，下限则在1949年以前；

四、同类或同处的碑刻，视情况而定，或捆绑同条，或析居分立；

五、碑刻所牵涉的著名宗教场所及名山胜迹，于其首见条加以简介说明；

六、定名需综合、简化、典型、准确、无误、无疑义、无混淆，力求做到言简意赅、名从主人，避免模糊、笼统概念，如“功德碑”、“庙碑”、“四至碑”、“万古流芳碑”等；

七、定名凡遇塔幢类、墓志类、墓碑类等，均冠以年代，并标注主人名号；

八、“解题”中凡有缺项，应加简单说明，即于括弧中标出，如“限于条件，暂时无法核对”等；

九、“录文”以力求准确为原则，尽量照顾原碑原字，而采用规范汉字加以誊录；

十、“录文”中凡不能亲自校勘原碑原帖的，应加简单说名，亦于括弧中标明，如“暂时无法核对原文”等；

十一、录文辨别确认碑文但仍有疑问时，在其后以(?)或于括弧中加入疑误字加问号来表示。

十二、被“注释”词语在录文中以下划线标出，“注释”部分一依文中

出现次序逐条作注，不标序号；

十三、“按语”部分努力按照考证的标准去做；

十四、“注”、“解题”等中所引用的历史年号，在其后（ ）中标注公历时间，如：乾隆二十年（1755）、乾隆初（1736）、乾隆末（1795 及以前）等，余此类推。

